序

贾春峰

当《小人物评〈孟子〉》再版重印之际，北京图书传播研究所和作者杨治国同志希望我能写篇序文。我思索再三，写些什么呢？自己并不是孟子学说的研究专家，本没有什么发言权，但又一想，对于这样一本书确有兴趣，好，那就以个人兴趣所至，说几句感想式的话吧。

首先，我要说的是，作者杨治国同志身为和顺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其工作之忙，公务之繁，是可想而知的，但能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孟子，写出这样一本大作，可见他勤奋好学、善于思考，表现出了深厚的理论功底、逻辑思维能力与写作能力。这实在令我敬佩。还要说到，作者生于和顺，长于和顺，又在和顺为“官”，这“和顺”二字猛然引起了我的联想，因为《周易》上有一段话就是说：“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这是《周易》上的一段很重要的话。不知和顺县县名的确定同《周易》上的“和顺”二字有无关系？当然这只是一种猜想，并没有查证。所以有此猜想，是因为中国的有些地名，就是从古书取其义的，如贵州省的“遵义”，从唐代贞观十六年“更罗蒙为遵义”，就是取义于《尚书》“无偏无陂，遵王之义”；再如北京的有些地名，像忠恕里、仁寿路、里仁街、恭俭胡同等等，就是出自《论语》的。话还是回到杨治国同志的孟子点评上来，他身处基层，在点评中带着浓厚的平民感情，以独特的视角，就许多问题包括民本人本、三种生态观等等，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观点，这更是难能可贵。北京图书传播研究所的同志说：“学术研究无禁区，学者身份无高低。”我赞成这两句话。作者是“县官”，又是学者，自称是“小人物”。其实，在学术见解上，在学术观点上，是不能以“身份”论高低、论大小的。学者就是学者，学者只能以学术见解、学术成就来评说。学术面前，人人平等。

第二，我要说的是，这本书把我的思绪，从现实拉到了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而又从那久远的岁月拉回到今天。这就令人从历史思考、古今关照中获得许多启示意义。回想起来，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时，先秦诸子的哲学思想是我的一门必修课，但那仅仅是学学而已。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在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五七”干校，曾想就春秋战国哲学写一本小册子，但被中断了，只是几年后就此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讲孔子哲学思想的；另一篇则是研究后期墨家的思想。真正想下工夫学习研究一下春秋战国诸子学说，还是近些年来的事。因为我研究的“文化力”诸要素中就包含有优秀传统文化的力量，而讨论现代企业文化、现代企业精神、现代企业家精神，也不能离开中国国情，不能离开这个深厚久远的文化根脉和文化背景。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谐文化。这些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与深远历史意义。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和谐是中华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和谐文化既是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同时指出，建设和谐文化要“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发掘民族优秀文化资源。”这些讲话非常重要。我认为，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民族优秀文化资源，就包括儒学文化的精华，而儒学文化精华当然包含“亚圣”孟子的思想精华。我在《培育创新文化与和谐文化》（2007 年 8 月 10 日《人民日报》）一文中，讲到和谐文化的历史传统时，就引用了孟子的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说，这里强调了“人和”的重要性。当然孟子的思想，包括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等等，是博大深厚的。他的许多论述，诸如“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皆可以为尧舜”；“仁义礼智根于心”；等等，可以说，都长期铭刻在人们的心灵帷幕上，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座右铭，成为人们的思维准则和行为格言。这是民族文化潜移默化、世代相传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

第三，我要为杨治国同志这本书的再版表示祝贺，想了以下四句感言式的话：

小人物点评孟子
大智慧千古传承
民为贵天经地义
浩然气激荡心中

谨以此作为我的贺词吧。

最后，希望本书作者继续边工作边研究，忠诚敬业，再创佳作，为我们伟大祖国实现新的伟大振兴，为老百姓生活得幸福安康，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为原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理论组副组长，中宣部原理论局副局长、正局长级研究员，欧洲科学院院士，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文化研究会副理事长，著名理论家，被誉为“‘文化力’研究第一人”。）

自　序

我的少年读书生活，尽管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疾风暴雨中度过的，但因年龄甚小，只记得戴过像章，背过语录，别的几乎无甚印象。而我所不同的是，由于家传、家学的原因，祖上留下了不少藏书，有历史的、文学的、医学的，更多的则是传统文化方面的，有蒙学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幼学琼林》、《增广贤文》、《千家诗》、《朱子家训》、《五字鉴》、《小学章句》、《颜氏家训》、《孔子语类》，等等；还有所谓“四书五经”与朱熹的《四书集注》以及《淮南子》、《诸子集成》等等；不仅有石印、木雕版，还有手抄本，版本还真不少。以此之故，我的小学实际上是从所谓蒙学开始的。及至上了初中，赶上“批林批孔”运动，评法批儒，斗私批修，方知自己所学乃为时人所“不齿”，然而由此却生出许多困惑与迷惘：蒙学类的那些书中，尽管内容比较驳杂，但主要的思想还是孔子的、是儒家的，是孔孟之道，流传两千多年的东西，还有孔子跟林彪是什么关系？为啥“批林必批孔，批孔必批修”？像我那样的年纪与学识，决然不可能搞得清楚，何况所谓学习不过是在父亲严逼下，生吞活剥、囫囵吞枣地背了一些东西而已，其实根本谈不上是学，更不会有所识。唯一所幸的是，自己比同龄人较早地接触到了传统的一些东西，啃这些枯燥无味的东西时，心里即使生出许多抵触来，却更多地生出些自豪与骄傲来，毕竟别的同学甚至老师们也没有机会看到和读到我所能见到、读到的这些用父亲的话来说是“珍贵藏品”的东西。不过，很多时候自己又显得十分狼狈，因为自己不得不从“之乎者也”与“的地得了”之间的古今文法语体的冰河中趟过来、趟过去，弄得不是“之乎”进了“的地”，便是“得了”趟进“者也”。那种感受，只有那个年龄、那个年代、那个年级、那个境况的人才会有真切的酸涩体会。

我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十六七岁，正赶上了深入“评法批儒”，评《水浒传》，批投降派、走资派。记得当时满墙大字报，批孔子（时称孔老二）、孟子，赞扬少正卯、柳下跖，推崇商鞅、韩非子。我因能写几下毛笔字，所以有一段时间被学校“委以重任”，别的同学参加开门办学基地劳动，到松烟村大平垴种地、家后沟开荒、阳曲沟砍木材盖校舍、瓦窑滩种水稻，我则在教室里记广播，抄报纸，照着写

大字报，批林批孔，歌颂法家。我们写的所谓大字报，其实净是些七拼八凑，胡写乱画的东西，当时的要害就是不管你抄写什么儒家言论，只要骂上几句就行，但这骂还不能瞎编，必须要照报纸的口径、学校的要求，不然会骂出麻烦。比如大人们都说孔老二好，你却必须照报纸上那样写上他们本来被老百姓说好的话，再骂上一通反动。否则你就成了“反动”。一次心血来潮，我从家里避着父亲偷拿了一套石印本《商君书》、《盐铁论》、手抄本《大学章句》，还有一册看不清什么“堂”刻印的《周官正义》，带到学校去作为参考书，断章取义，摘抄段落，供写大字报用。自己当时已知道这些书是“四旧”的东西，不能公开，就偷偷放到书桌的“兜兜”（当时学生这样叫）里，还用报纸包住，以防让人发现。但是，最终还是不知被什么人给发现了，没多久就不翼而飞，至今再未得见。当时，因为家里不缺这些书，加之年龄小，不懂得这些版本的书还有收藏价值（不过收藏也是近十多年的事），所以也没有怎么太着急，倒有些无所谓，只是此事到父亲去世，也没敢让他知道。这期间，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对孔孟的一些东西已开始有所领悟，至少有了一些理解。所以对批孔怎么也弄不明白，说孔孟是反动的、没落的人物，说他们的学说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两千多年，说统治者利用他们的学说迫害压榨了人民两千多年，如此等等。我当时想，我怎么总觉得孔子的话就不错呢？孔孟生前并未被统治者所用，反而正如当时大字报每天必用的几个字一样“四处碰壁，如丧家之犬”呢？他们死后即使被人利用了，那是后人的事，跟孔孟有甚关系？他们怎么就反动了呢？对于这些，自己除了不解，还是不解。也难怪，以自己生活的那个时代，以自己那个年龄，别说我弄不明白，恐怕多少大学者也不会或不能弄明白的。

带着这个困惑，也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更带着那个年代的稚气，我在恢复中高考制度的头一年，在不健全的“贡院”里，以不完全的知识结构与层次领取了所谓的高中文凭，以参加高考名落孙山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回家后，我又重新钻进祖上的藏书中。然而，岂料此时却成了重新了解儒家、了解孔孟的开端，更岂料这一头扎进书堆中，竟一扎二十多年，再也从书堆中拔不出头来。

二十多年来，我时不时想起当时写大字报批林批孔的细微末节，总不免生出一丝淡淡的哂笑，那时的孔孟多么悲惨，那时的我多么荒唐！回首十年，回首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五百年五千年，一种文化、一种思想一旦产生，一旦扎根于产生她的那块土地中，有谁能真正凭借文的武的或别的什么使她毁灭呢？你能批但能使她臭了吗？秦始皇有过焚书坑儒，朱元璋有过逐孟子出孔庙，我们有过“文化大革命”、有过评法批儒，但结果如何呢？这大约就是文明与悖文明的对抗规律吧！儒家经典《礼记 · 中庸》第三十章有句话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周易 ·系辞下》说:“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千百年来,儒家及其思想本身,从来没有刻意去反对过别的学说和思想,在《论语》里,我们可以见到那些隐者对孔子的批评和讥讽,看不到孔子的激愤与反击;从《老子》、《庄子》、《墨子》中可以见到他们对儒家的抨击与反对,却在《论语》、《孟子》中看不到反击的语料,即使孟子对杨朱、墨翟的批评,也是以理服人,而不是盛气凌人的恶意攻击。然而,儒家的这种宽容与忍耐,换来的却是千百年来不停息、无休止的抨击与驳斥。当然,尽管如此,千百年来,能够超过儒家对中国、对世界影响的学说与思想并不多。我想,这大概就是儒家那种伟大的宽容与忍耐恰恰铸就了儒家思想的光焰与永存!

应当承认,由孔子创立并在中国历史上得到长期、不断发展的儒学,是以孔子为开山鼻祖,以《诗》、《书》、《易》、《礼》、《乐》、《春秋》为主要经典著作,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思想的学术体系,它在战国时代成为显学之后,一直是我国绵延时间最长、对中国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影响最大最远最深的一个学派,也是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的优秀文化遗产。目前,学术界把儒家的发生、发展、演变和衰落过程大致划分为五个历史时期:即先秦为儒学的形成和初步发展时期;两汉为经学化的时期;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为儒学的玄学化和儒、释、道融合时期;宋明为儒学的理学化时期;清代为儒学的衰落时期(参考《中国儒学史》)。从清末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至近几十年来,一直有人试图全面否定儒家思想,理由是儒家思想是一种剥削阶级意识形态,是压迫和欺骗人民的思想工具,已成为一种历史包袱,不仅不能发挥历史作用,还起阻碍作用,甚至把列强对中国的凌辱也说成是由儒家思想造成的。这样从清末到近几十年来,儒家思想的发展几乎是江河日下,难得大有振作。基于这样的原因,我痛感国人对自己优秀文化传承的随意与浅薄,更反对那种把仁义道德说成是“吃人”的说法(鲁迅先生语)。我坚持坚决地认为:第一,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伦理型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哲学思想,在后来两千多年间被统治者所改造、所利用,那是统治者们的事,不能归罪于儒家思想。第二,对孔子、孟子要别本清源。历史上的孔孟,由其各自的著述《论语》、《孟子》可以认知,后来历代儒家也好,统治者也好,他们按照各自的需要与各自的理解所创造的孔孟,不能与历史上的孔孟等同起来。原生儒学与后继儒学,具有很大的不同,具有各自的特点,但宗师与后学是传承关系,传承关系本身就是一种衍变方式。不客观地区分这种关系,把二者混为一谈,势必会因后学的变异而否定孔子的宗师地位,进而否定儒家、儒学的全部。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后继儒学的功能与作用,更不能认为衍变方式是对原生儒学的摧残,只不过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罢了。第三,要注意按照历史的发展逻辑与儒学的发展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辑，从儒学中特别是从原生儒学中挖掘其有利于中华文明发展与中国现代化的有益思想精髓，为开启新的思想航程与历史航程发挥儒家思想的新作用。事实上，儒学本身就是一个开放性、宽容性兼具的庞大的思想系统，从其发展脉络看，除去两汉“独尊儒术”的畸形外，宋明儒学（含隋唐儒学）吸收了佛道思想，使疏于思辨性的儒家学说更加哲学化；近现代新儒学是借助今文经学的形式，吸收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使儒学近代化；现代新儒学是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发展理气、心性学说为本位，吸收融会西方现代哲学，寻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从而展示了新儒学的时代特征与开放性意义（参考《中国新儒学史》）。至于胡适先生所谓“儒学被废黜”的论断，那只是一种偏见，历史将会证明其所论之错误。事实上，儒学已经与中华文明融为一体，它绝不会从中华文明、中华文化中脱胎而去，独身消亡。方克立先生在《现代新儒学辑要丛书》总序中指出：“现代新儒学或现代新儒家……已迅速地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的一个新领域、新热点……更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性思潮的趋势。随着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域外的各种思潮蜂拥而入，这种本来就是在中国土地上产生，并以维护中国民族文化精神为旗帜，以解决传统和现代化、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为宗旨的思想学说……在（20 世纪）80 年代中国的文化讨论中俨然成为了一派显学。”我认为，这种学说现象与学说态势，本质性地说明了新儒学也好，传统儒学也好，都有其在中国发展的本体逻辑和必然动力，说明了儒学对中华文明、文化和中国现代化的现实意义。因此，推动新儒学发展自然而然应成为当今思想、文化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我深切地认为：任何一种文明、一种文化，必然地同时根植在三种生态环境中，即自然生态、社会生态、人文生态这三种生态环境中。这三种生态环境，任何一种环境的恶化，都可以导致一种文明、一种文化的毁灭。而且，从本质意义上讲，三种生态是互相关联着的统一体，一种生态的恶化，必然会形成对另两种生态的危害。而当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起决定作用的往往是人文生态，人文生态决定社会生态，社会生态决定自然生态。如果说，玛雅文化不是毁灭于一夜之间的地球灾难（或曰天体灾难），那就应当是毁灭于我所认为的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的突变。因此，我更深切地认为，当今中国，自然生态问题越来越严重，但这并不可怕，关键是必须努力防止人文生态的恶化以防止社会生态的恶化。我们现在自然生态的恶化，哪一个与人文生态、社会生态无关？所以，拯救自然生态，首先当从改善人文生态进而改良社会生态开始。《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特别是十四大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公民道德建设

迈出了新的步伐。但是，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社会的一些领域和一些地方道德失范，是非、善恶、美丑界限混淆，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见利忘义、损公肥私行为时有发生，不讲信用、欺骗欺诈成为社会公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现象严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损害正常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损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应当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重视。因而提出了在新世纪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顺利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就必须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的同时，切实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公民道德建设的不断深化和拓展，逐步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这是提高全民族素质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对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形成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促进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认为，这一大段话，充分说明了三大生态环境的关系，是十分精辟的论述。“八荣八耻”的提出，使公民道德建设更加具体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了更加明细的道德规范，对改良人文生态和社会生态乃至自然生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代新儒学的奠基人之一、哲学家熊十力先生是极力主张“道德救国”的倡导者，他曾指出：“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伟大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大力倡导“道德救国”，与熊先生紧相呼应。

儒家思想，作为一种政治伦理文化，首先主张的正是“为政以德”，其学术的核心：仁，仁政，核心又正是“德政”，是“以德治政”。同时，儒家所形成的一整套政治、人性、伦理、哲学思想，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修身以德”、“齐家以德”、“治政以德”，完全表明了儒家的德治思想。试看，我们曾反对的“三纲五常”与原生儒学到底有多少关系？那种被“打倒”的“孔家店”与真正意义的“孔家店”到底有什么关系？真正的“孔家店”为什么百年后仍然不倒？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去思考吗？我们用被封建统治者“造圣”所造出来的糟粕文化作为儒家思想，并同时把中华优秀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一同打倒，这里面该有多少值得我们反思、深悟、长叹的东西啊！如果说，这不是一种历史逻辑的颠倒，便是一种政治逻辑的癫狂！于是，我坚信，真正的孔家店，谁也打不倒！我们的科学态度应当是吸收精华，弘扬精华，剔除糟粕，升华精华。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真正与时俱进，建设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孟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哲学家，是孔子之后真正能承前启后的“醇乎醇者”（唐·韩愈语）。他的许多思想主张，承继于孔子，却又极有创新，尤

其在仁政、人本、民本、民主思想、德治等方面，虽时逾两千多年而仍闪耀着熠熠光辉，这是跨越时空、超越国界的伟大思想。余对孟子之推崇，诚心备至。因此，在大力推行以德治国的今天，在亟须解决“自然、社会、人文三大生态”问题的今天，余苦心孤诣点评《孟子》，不顾自己乃点评《孟子》中千古第一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不怕担当不知天高地厚之责难，尽心竭力，潜心评点，正在于弘德济世，达仁治世，勤民益世，实乃废寝忘忧，可掬厚土；耿心丹志，可鉴青天。余评完搁笔，叹息再三，以余萤火烛光，可堪也哉？可堪也哉？!

困心之时，赘笔自序。

杨治国

前　言

（一）

孟子，姓孟，名轲，一说不知其字，一说其字子舆、子车、子居、子与、子兴，多采不知其字之说。为战国时邹国（今山东省邹城市东南）人，是鲁国贵族孟孙氏后裔，然而至孟子时家境早已衰落了。关于孟子的生卒之年，史料无确切记载，后世多为推断，一说约生于周安王十七年（公元前385年），卒于周赧王十一年（公元前304年）前后，终年82岁。一说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公元前372年），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89年），终年84岁。依《孟子》本书来推断，前一种说法比较可信。总起来说，孟子当属于生活在战国中期的人。《春秋演孔图》和《阙里志》等书上说孟轲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母亲仉氏。有关孟子身世比较可信的史籍，首先当推《孟子》本书，其次是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如果从《孟子》本书推测，孟子第一次到齐国时，正当齐威王之世（《公孙丑章句下》）。威王三十年，宋王偃开始称王，并欲行仁政（《滕文公章句下》），孟子闻之而到宋国。不久，孟子回到邹国，与邹穆公问答（《梁惠王章句下》）。后来，鲁平公即位，孟子便到了鲁国（《告子章句下》）。此后，孟子又到过滕国，因其国小，难有大的作为，便到了梁国（《梁惠王章句上》），此时已年近七十了。次年，又从梁国到了齐国，“加齐之卿相”（《公孙丑章句上》），“出吊于滕”（《公孙丑章句下》），大约在这一期间。宣王五年，齐国伐燕。两年之后，“诸侯将谋伐燕”（《梁惠王章句下》），孟子劝宣王“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然后去之，则犹可及止也。”但是，宣王不听，次日燕国与诸侯的军队齐心协力大战齐军，齐军大败。齐宣王对人说：“吾甚惭于孟子”（《公孙丑章句下》）。然而孟子却因此而不得不辞职。孟子失望之余，又虑自己年岁已大，其仁政主张，王道大业又不得实现，无奈说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公孙丑章句下》）。此时，孟子已年过七十余岁，至此后便结束了游历游仕生涯，“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如果从司马迁的《史记》来探寻，有关其身世与师承的文字也极简洁，仅两句话“孟子，驺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此外，东汉学者赵岐的

《孟子题辞》上说："或曰，孟子鲁公族孟孙之后。故孟子仕于齐，丧母而归葬于鲁也。三桓子孙，既以衰微，分适他国。"《孟子正义》疏曰："孟子既以孟为氏，宜为孟孙之后，但世系不可详，故赵氏以'或曰'疑之耳。"又说："鲁桓公生同为庄公，次庆父为仲孙氏，次叔牙为叔孙氏，次季友为季孙氏，是为三桓。"阎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说："孟子，盖鲁公族孟孙之后。"郭璞云："绎山连属地，北有牙山，牙山北有唐口山，唐口山北有阳城，北有孟轲冢焉。"这些都较为可信。西汉学者韩婴的《韩诗外传》中记述了孟子母亲"断织"、"买东家豚肉"、"不敢去妇"的故事。《列女传·母仪篇·孟轲母》载："孟轲少时，废学归家，孟母方绩，因引刀断其机织，曰：'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生有淑质，夙丧其父，幼被慈母三迁之教。" 西汉学者刘向还在《列女传》里记述了在孟子年幼时，为使孟子有个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三迁居所的"孟母三迁"的故事。《列女传·母仪篇》云："邹孟轲之母也，号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游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吾居处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戏乃贾人街卖之事。孟母又曰：'此非吾居处子也。'复徙舍学宫之傍。其嬉戏乃设俎豆，揖逊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从这些记述中我们可以肯定，孟子少小丧父，家道贫寒，有赖其母贤淑教诲，发奋读书，终成学业。《列女传》说："孟子旦夕勤学不息，师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虽各家对孟子师承关系有异，但对其耐贫苦学是一致的。孟子虽曾"加齐之卿相"，但始终未能有实现其人生理想与政治抱负的机会，直到其辞世千年之后，才成为朝廷加封、享受庙祀（北宋景祐四年公元 1037 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创建孟庙）的人物。

《孟子》一书，历来对其作者有多种说法，主要有三种意见：第一为合著派。认为此书虽有其弟子参与，但主要由孟子在生前编定，其代表人物是司马迁、魏源等。第二为自著派。认为该书完全出自孟子之手，其代表人物有赵岐、朱熹、阎若璩等。赵岐《孟子题辞》说："孟子亦自知遭苍姬以讫録，值炎刘之未奋，进不得佐兴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余风，耻没世而无闻焉，是故垂宪言以诒后人。仲尼有云：'我欲讬之空言，不如载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于是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答问，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阎若璩说："七篇为孟子自作，至韩昌黎故乱其说。《论语》成于门人之手，故记圣人容貌甚悉；七篇成于己手，故但记言语或出处耳。"又云："卒后，书为门人所叙定，故诸侯王皆加谥号焉。"第三为弟子派。认为此书系孟子弟子在孟子死后编定，其代表人物有韩愈、张籍、晁公武、林慎思、苏辙等。韩愈在《答张籍书》中肯定地说："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耳。"后世多倾向于司马迁的合著说。司马迁在《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司马迁生活的时代较早，其所掌握的

史料，所获得的传闻当比后人要多，要可靠，所以人们一般倾向于《史记》的观点。

赵岐把《孟子》七篇各分为上下卷，更分若干章，计二百六十一章。朱熹则将《尽心章句上》中的“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夫非尽人之子与？’与“孟子曰：‘王子宫室、车马、衣服多与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况天下之广居者乎？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吾君也？’此无他，居相似也。”合并为一章，两节大意相通，同述一人。故流传于今的《孟子》现为七篇，每篇分为上下章，共三万四千余字，计二百六十章。《班固·汉书·艺文志》则说：“《孟子》十一篇。”而东汉赵岐在为《孟子》作注时，将其分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并对十一篇的真伪进行了鉴别，确认其中内七篇为真，在《孟子题辞》中说：“《外书》四篇《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则其文不能弘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后世依放而托者也。”这样，从东汉以后，这四篇便先后亡佚了。赵岐直指外四篇为后人伪作，且不给此四篇作注，当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的。

赵岐还强调说：“孟子退自齐、梁，述尧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贤拟圣而作者也。”又说：“《论语》者，五经之錧鍵，六艺之喉衿也。孟子之书则而象之。”直接将《论语》与《孟子》相提并论，说明了《孟子》一书在汉代就已为学人所极为重视，极为推崇了。

（二）

《孟子》是儒家的经典名著。由于《孟子》是“拟圣而作”（清焦循《孟子正义》疏曰：“拟圣，即所谓述仲尼之意也”），所以《孟子》一书，在战国时代被列为子书，到汉代被认为是一部辅翼经书的传，《汉书·艺文志》把《孟子》列在《诸子略》中，与诸子及孔子的《论语》相并列。汉文帝曾将《论语》、《孝经》、《孟子》、《尔雅》各置博士，叫传记博士。东汉王充《论衡》云：“杨墨之学不乱传义，则《孟子》之传不造。”可见王充把《孟子》是视为“传”的。《汉书·梁翼传》、《说文解字》等书引用《孟子》一书时，皆称“传曰”，可见两汉时《孟子》已由子书升为传记了。《孟子》一书升入“经”列，当由唐代开始。据《新唐书·选举志》记载，唐代宗宝应二年（公元 763 年），礼部侍郎杨绾上疏，奏请将《论语》、《孝经》、《孟子》兼为一经。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极力推崇孟子，说孟子是儒家仅有的正统继承者，强调孟子在儒家道统中的地位，说：“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昌黎·原道》）。这便奠定了孟子作为儒家正宗的地位。到五代时，后蜀主孟昶则下诏令母昭裔楷书《书》、《诗》、《易》、《周礼》、《公羊传》、《仪礼》、《礼记》、《左传》、《谷梁传》、《论语》、《孟子》等十一部经书刻石，自此，《孟子》一书作为经书被刊行天下，广泛传播。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宋朝被列入十三经，宋太宗曾令翻刻。宋朝熙宁四年（公元 1071 年），王安石推行变法，改革科考内容，以《论语》、《孟子》为“兼经”，列为考试科目，使《孟子》从十三经中突出起来。到了南宋，大儒朱熹从《礼记》中选取《小戴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合编一起，集毕生精力为其校注，后世称之为《四书集注》，又称《四书》。从此，《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门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孟子》由此成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也成为后世历代王朝官方钦定的经典必读书。北宋元丰六年（公元 1083 年）孟子被追封为邹国公，元代文宗至顺元年孟子被诰封为邹国亚圣公，成了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人物“亚圣”，到了明清时期，儒家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科举取士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集注》中选取，要求士子文生必须“代圣人立言”。这样，《四书》便成了封建文人士子必修的课本，《孟子》一书也因此成为明清时代士子文人的主修经书。《孟子》作为儒家经典，登上了封建政治思想的巅峰，地位极其高贵。一如蒋伯潜先生在《十三经概论·自序》中说：“《孟子》一书，两汉时，在古籍中之地位，已在《论语》之次，经子之间，传记之列矣。”“明清又以四书文取士，《孟子》乃成家弦户诵之书耳”。康熙曾亲撰碑文颂扬孟子“岳岳亚圣，岩岩泰山，功迈禹稷，德参孔颜”（《御制孟子庙碑》）。乾隆亲书“道阐尼山”，“尊王言必称尧舜，忧世心同切禹颜”联额，悬刻于孟庙“亚圣殿”之内，并两次亲谒孟庙，以一跪三叩之礼拈香祭拜孟子。帝王尚且如此，可见文人学子对孟夫子之尊崇决然不会不如帝王，由此可见孟子在政治、社会等方面的地位之高。

（三）

孟子一生以孔子为自己的人生典范，自称是孔子的忠实信徒，在《孟子》一书中说：“乃所愿，则学孔子也。”认为“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提出了尧、舜、汤、文王、孔子皆为先贤古圣，人当法之的主张。他自己则以接受并弘扬了孔子的真谛与传统自居，指出：“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他曾慨叹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然而，孟子极力推行儒家道统，力求平治天下之志，十分令人敬仰。他曾十分自信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天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纵观孟子的一生，他确实是不仅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而且可谓真正发展了孔子的思想，继孔子之后，进一步建立和充实了系统的儒学体系，成为战国时期儒家正统思想的主要代表，为后来儒家思想的发展、道统的发扬，起了十分巨大的开拓作用。而且，在百家争鸣的战国时代，孟子在特殊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的历史背景下，既

吸收了儒家学派的深厚的学术文化修养，又摒弃了儒家早期的尊周室复周礼的保守思想，顺应人类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潮流，逐步形成了自己新的政治思想与学术思想，在与百家争鸣中维护并发展了儒家学派的思想，从而确立了孟子在儒家学派内部的主导地位，使其成为仅次于儒家学派开山鼻祖孔子的正宗大儒，被称为“亚圣”。在后来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孔孟之道”成为重要的极大地影响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学说，成为一种国家哲学，为历代统治者所尊奉。康有为先生在其《孟子微·自序二》中评介说：“举中国之百亿万群书，莫如《孟子》矣。传孔子《春秋》之奥说，明太平大同之微言，发平等同民之公理，著隶天独立之伟义，以拯普天生民于卑下钳制之中，莫如孟子矣！探冥冥之本原于天生之性，许其为善而超擢之；著灵明之魂于万物皆备之身，信其诚有而自乐之；秩天爵于人人自有而贵显之，以普救生人神明于昏浊污蔽之中，莫如孟子矣。”康先生之所云，虽略有过誉之嫌，但余以为总体而论，确为中恳中的之见。

与此同时，还应看到孟子对后世文学以及文学语言之深远影响。孟子生活的时代，正是我国古典散文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创作走向辉煌的时期，孟子作为此时期杰出的代表之一，影响极大。清刘熙载在《艺概》上说：“韩文出于《孟子》”，“昌黎接《孟子》知养气之传”，“东坡文亦《孟子》，亦贾长河”，“王介甫文取法孟、韩”。可见这些文学大家都受到了《孟子》的影响。《孟子》一书，语法规范，文思缜密，逻辑性强，明快畅达，文辞犀利，或大气磅礴，或委婉细腻，遣词准确，语言活泼，清新洗练，对后来的文风、语言、文学影响极为深远。正如苏辙所说：“其文章宽厚宏博，充塞于天地之间，相称其浩然之气。”由此也可以说，《孟子》是一部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历史、哲学、文学乃至语言融为一体的集大成者。

（四）

以仁为纲的性善说是孟子哲学思想的核心。“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这是全面理解和准确把握孟子思想的极重要、极关键之所在。他认为，人的善良本性是与生俱来的，提出了“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命题。认为“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章句上》），指出人生来即有天赋之“四端”，即“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同上），认为此“四端”乃人所共有，且又人所独有。“四端”即人之本质属性，有无“四端”，系人兽之根本所别。于是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公孙丑章句上》），并将此四心与仁义礼智四德相对应，进而探讨人的道德起源问题。还说：“万物皆备于我”，指出人的善性不是人性与道德的完美，而仅仅是人性和道德得

以完美的开端，人就是要通过后天的知性、善性，使人之善性合于天之“道”，实现天人合一。可以说，性善说是孟子仁政思想的基石，性善论与仁政论也是孟子哲学思想、政治学术思想的两大纲领。

人本思想是孟子学说的基石，是打开其学术思想宝库的钥匙。在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型，原始人道主义开始萌芽过程中，孟子既继承了孔子的人性观，又超越了孔子，把人作为社会的核心，并提出了“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点，对人的高度重视，使他极端地反对战争，大声疾呼、斥责兼并、掠夺战争给人所带来的灾难，指出：“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离娄章句上》)，直斥“春秋无义战”(《尽心章句下》)，指出“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章句上》)，围绕保护人展开了与诸侯的论战。应该说人本思想是孟子学说的理论基石和追求所本！

孟子极力推崇的学术观点当是其民本思想与民主观点。在人本思想和仁政理想的支配下，他提出了“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梁惠王章句上》)，提倡“王施仁政于民，省刑法，薄税敛，深耕易耨”，“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同上)。诸侯都要使百姓能“制民之产”，“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把“五亩之宅”、“百亩之田”划给百姓，让他们自给自足。同时，孟子还非常反对不仁不义的等级制度，在坚持仁义之“礼”的前提下，主张“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太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公孙丑章句上》)。还明确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章句下》)的政治主张，这可以说是孟子政治哲学思想宝库中，最重要、最杰出、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匡古以降，再无能有超过孟子之思想者。这在奴隶社会末期，百姓被当做会说话的工具，任意杀戮的情况下，夫子能提出这样的政治观点与主张，可谓极其难能可贵，极其伟大。在对待君王上，以此种思想为出发点，他针对齐宣王说武王伐纣是“臣弑其君”的说法，理直气壮地答道：“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章句下》)。并提出：“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离娄章句下》)。在《离娄章句上》中，他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引据《太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观点，提出“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万章章句上》)，但天之选择依据在民，天受之，则民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则天受”，“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的主张，这实质上也就是以民心为天。这种原始平等思想与民主思想，闪耀着伟大的民主光环。

在用人用刑之道上，孟子十分重视老百姓的意见，即“民意”，对齐宣王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梁惠王章句下》）。孟子十分强调《太誓》上的：“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观点（《万章章句上》）。这种民本、民主思想，确实充分显示了孟子思想之伟大。

孟子十分重视环境对人的重要意义，强调环境对个人的道德修养、完备人性的重要性。他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告子章句上》），指出牛山并非不长树木之不毛之地，而是人为砍伐破坏的原因。人的善性、美德，如果得到化育、培养，就可以达到应有的境界，乃夫子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提出了“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的论断。还指出：“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章句上》）。究其原因，正是社会环境所造成的结果。

在修养人性与道德上，孟子提出的具体主张是：一要“求其放心”（《告子章句上》），即把后天丧失了的仁义之心努力寻找回来。要努力“反求诸己”（《公孙丑章句上》）。二要十分重视“居移气，气养体”（《尽心章句上》），即要充分注意到社会环境与人自身努力对完备人性和培养道德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三要“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梁惠王章句上》），通过全社会的道德教化，实现人性的自我完备与道德升华。

重视自然规律，遵循客观规律，是孟子思想的又一大特点，也是其科学思想以及科学哲学观的重要体现。他提出：“天下之言性也，则故而已矣。故者，以利为本。所恶于智者，为其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则无恶于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苟求其故，千岁之日至可坐而致也”（《离娄章句下》）。孟子认识到一切事物都具有其各自的客观规律，人们只有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行其所无事”，进而才能做到“不凿”。否则，则会“有事”，乃为“不智”。虽然天高无限，星远无涯，但只要能按其规律去推求，即使是千年之后的冬至日，也完全可以在家中推算出来。孟子这种重视自然规律和遵循客观规律的态度，充分显示了其朴素唯物论的思想观点，集中体现了他的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观。在古代科学极不发达的条件

下，他能具有这样先进的科学思想，是极为难能可贵的。这是对古代神学思想、天命观、唯心观的一种直接否定，也是对其“民心即为天”、“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的民本民主观点的科学诠释，集中反映了他心中的“天”实为百姓，他眼中的“天”不过是“可求其故”、“坐而可致”的一个自然质体，并不神秘，不可怕，并不能使人怎样。真正能给百姓带来福泽的是天子、诸侯，而给人带来灾祸的也恰恰是这些天子、诸侯。所以他说：“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可见，在孟子的心目中，他的“天”非常明白、明确。长期以来，人们比较重视孟子的民本思想，而对其科学思想从未加以注意，更谈不上研究他的科学哲学观。这是十分令人遗憾和十分不对的。我以为，大凡一个有民主思想的人，往往也会具有一定的科学思想。民主和科学是一对孪生姊妹。孟子的伟大之处，我认为正是其可贵的朴素的科学观和民本民主观。从这个意义上讲，孟子不仅是一位伟大的“亚圣”，也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和民主先驱！

以天下为公，君臣士庶皆使其行合乎天之公理，不以利交征，是孟子平治天下之重要思想。《孟子》一书，开篇即论利，“梁惠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梁惠王章句上》），他直接了当地反驳惠王言利之说。在《告子章句下》中，孟子又说：“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指出了“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告子章句下》），“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告子章句下》）提出：“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离娄章句上》），“以善养人，然后能服天下”（《离娄章句下》）。孟子这种反对天下交征利，危及天下的思想，贯穿于《孟子》一书始终，集中反映了孟子势以仁义平治天下的仁政思想。

在修身养性上，他极重人之气节，提倡“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章句上》），坚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章句下》），倡导“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滕文公章句下》），“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告子章句上》），“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尽心章句上》），强调：“小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尽心章句下》）。反复说明了修养对人之重要。因而要求人一定要“反身而诚”，方可“乐莫大焉”（《尽心章句上》）。孟子的这些观点，对于人的心性、气节之修养，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和十分深远的影响。

“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告子章句下》）是孟子的一个警世观点。他十分强

调国家、君臣士庶有忧患意识则生，享安乐之幸则亡。可以说这既是孟子之前历史经验教训的高度总结与概括，也是为孟子之后几千年古今中外无数历史事实所充分证明了的英明论断。

孟子在仁政思想支配下，对正义战争也有十分精辟的见解，其著名的论点如“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堪称历史性名言。战争的决定因素，具有多方面的关系，孟子站在极其重要的战略的高度，概括性地从战争的本质规律入手，提出了天时、地利、人和的决胜战争的主导因素和条件，并把人和作为决胜的根本条件，可以说也是高度总结和概括了历代战争的基本规律后，站在历史的高度，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战争命题，指明了战争的特殊规律。这是对儒家学说中“和”的思想的深刻把握，是对“和”的观点的特殊运用，也是对天、地、人三者关系的特别总结。“和”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命题，一旦为孟子作为战争的概括性分析，即赋予了其特殊的意义。可以说，人和决胜论，是孟子对政治、战争，乃至经济的高度的、科学的、历史的哲学总结与概括，其中渗透了天人关系、人性的、人文的多层面、多视角的思考，是孟子对人类思想宝库的历史性贡献。

（五）

孟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既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也是世界思想宝库中一颗璀灿的明珠。两千多年来，孟子思想对中国和世界历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我曾专程到山东拜谒过孔庙、孟庙，肃立大殿之中，瞻仰圣像，崇敬之心顿生，曾经赋诗一首，收录在北岳文艺出版社给我出版的诗集《荷香斋诗草》一书中：“究通天人际，思想集大成。春秋三千子，论语九州心。炎黄淌血脉，孔孟铸魂灵。远溯四古国，唯吾中华兴。”这首诗代表了我对孔子、孟子对中华民族历史贡献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我认为，历史地、哲学地看，能真正究通天人关系，集人类思想之大成，为中华古国提供文化核心，铸就中华民族伟大魂灵者，唯有孔、孟堪当。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没有像其他三个文明古国一样走向衰落，至今仍岿然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其万世功绩，正在于我们有孔孟之圣，有儒家文化，有以此为核心的中华思想文明！反思几千年的中华历史，我们能够生生不息，自强不屈，能够战胜来自自然的、人类的、文明的诸多灾变、争斗、冲突；能够有无数仁人志士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民族的气节，都能愈挫愈奋，不屈不挠；我们能够经受住无数历史风浪暴虐的摧残，根本的思想原因，正是来自像儒家优秀思想这样的思想文明。这应当说是一种历史结论与文明总括。

当然，在充分肯定孟子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功绩的同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